



重放的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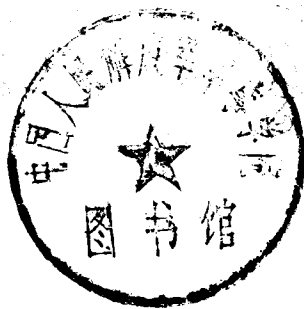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36 9532 2

重放的鲜花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左 泥

装 帧：方 昉

封面题字：周 为

重 放 的 鲜 花

本 社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11,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书号：10078·3087 定价：1.15元

前 言

这本集子里，收集的都是发表在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在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面对当时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一些作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如何多样化，进行探求，并且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不久，这些作品却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判，有的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解放十七年的文艺作品大张挞伐，这些作品更是首当其冲，属于斩尽杀绝之列，从此被长期禁锢，不得再见天日了！

粉碎了“四人帮”，这些先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也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为了使一些长期被禁锢的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选取了一部分在社会上有过一定影响的篇章，编辑成这本集子，并且把它题名为《重放的鲜花》。

重读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

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借以拨动人们心中的“情弦”，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它们能发人深思，促人猛省，引人向上。总的说来，这些“干预生活”的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它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为爱情而爱情，它们都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即使其中的某些篇，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只要遵循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不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不把政治思想方面的一般错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同起来，就不应该剥夺它们与读者见面的权利，不能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缺点错误的大小，将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评定。

编 者

目 录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 (1)
爬在旗杆上的人·····	耿 简 (38)
本报内部消息·····	刘宾雁 (64)
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刘宾雁 (100)
在悬崖上·····	邓友梅 (129)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 (162)
小巷深处·····	陆文夫 (201)
平原的颂歌·····	陆文夫 (217)
太阳的家乡·····	公 刘 (230)
沉默·····	何又化 (248)
草木篇·····	流沙河 (253)
科长·····	南 丁 (255)
寒夜的别离·····	阿 章 (267)
西苑草·····	刘绍棠 (279)
被围困的农庄主席·····	白 危 (305)
入党·····	耿龙祥 (334)
杨妇道·····	方 之 (343)
改选·····	李国文 (352)
红豆·····	宗 璞 (366)
美丽·····	丰 村 (398)

在桥梁工地上

刘 宾 雁

一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儿，才迈着小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来采访我们啦？好！”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说：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铁桥正在建造。从下面

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象一条彩虹似的。简直不能想象，就凭这么一根窄窄的钢筋水泥的拱架，能经得住几千吨重的列车不断开过。好象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说：

“这是中国第一座钢拱桥。不用钢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宽，不简单哪。从前，连想也不敢想。”

罗队长给我详细介绍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现状。我们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脚下就是奔腾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风和水向我们扑来，越来越浓，象水的清香，又象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觉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我们顺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释着几十丈高的钢塔，新来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绑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说：“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这可不是咱们白天黑夜搞抢修那时候了”……

忽然间，从左侧传来一阵比春雷还响的轰响。接着，有几块小石头从山上一直滚到我们脚下。一刹那间，觉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颤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说，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说：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大——爆——破，这叫大爆破。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药一块填进去，送药的‘眼’儿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啊……”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们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们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软，象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带子。

“不简单哪，”他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前，几十年间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们就一鼓气儿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们造桥，你们报道！……”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桥梁专家。讲业务，不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年他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队长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愉快的。在我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眼睛直视着前方，一股说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使劲揉着眉头，叹了口气说：

“你是要找工程师是不是？”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报纸上介绍介绍。”

我想问，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话收住，

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场走去。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维本房间里。

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黄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象帐篷，可以不受任何风雨的威胁，除了大风天气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简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住在旷野里。也不象窑洞，一点不觉得有甚么阴沉。

在我的房间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话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谈话中断。各处工地在电话里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技术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象。说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呢，已经请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问题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然，有不少问题，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见的，但紧接着就一准说——“这是局里张总工程师说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话呀，队长的意思”……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请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见呢？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装吊工人谈话，隔壁又传来周主任打电话的声音——

“哎，别急嘛，不请示局里怎么行呢，王处长说这两天就批示的……”

这时候，那个名叫张广发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丝拿到北岸去都要请示，要你这个主任干屁呢？为了你这请示，我们窝了八天工了……”

说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给我讲，甚么叫“骑马扣”，甚么叫“鸳鸯扣”……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哼，灰尘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砸死，还叫工程师、主任呢！曾工程师就不这样。跟你说，干起重工的，就愿意跟这样工程师干。他敢决定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二

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着拿一个资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工程师曾刚。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论：“工程师连工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说……”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前些日子人家还给部长写过一封信呢。”

“甚么？别瞎扯了！”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有没有回信呢……”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逢到工程局来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见却分为两派。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比方说，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队的三分队却建议在钢板桩里、在水下造沉井，说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块钱。多少年来，桥身施工脚手架都

是在水上搭的，形状象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议把它挪到岸上来，形状也改变一下，说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说过：“同样一块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别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刚。

但是传说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问题。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轻人就为曾刚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辩论。那是抢修渭河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钢梁已经朝便桥这边歪下来，看样子一阵大风就能把它给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定主意，踌躇不前。曾刚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指挥工人用“千斤顶”把钢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曾刚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险——万一吊不起来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没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反对这个意见的人说，曾刚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计算和经验，不能叫冒险，事实证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没甚么不对，——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道“工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听到的许多关于曾刚的意见，放在一起就是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争辩。部分人是用钦佩、敬羨的口吻肯定曾刚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则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个人冒险，幼稚，不讲究科学……

我听到的，毕竟还是后一种意见更多一些。虽然没有轻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预料的完

全相反。这几年采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恼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了。分队的计划，每月都超额完成。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种杂乱无章、盲目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稳当。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不同，他亲自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如此等等。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

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负疚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验，当然就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正象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当然，象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含着比方法问题更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下作业呼吸困难，脸都白了，浇湿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疏忽，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花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而是——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第三次谈话，曾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

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我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

“没错，一点也没错。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个立方公尺。混凝土工是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劳动力完成了四十个人的任务。”

电话里又说了一句话。我看见曾刚的脸色霎时变了，敲着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停下来，声音肯定而坚决地说：

“我没有权利捆住工人的手。至于质量，你们已经检查了三次。还可以来检查第四次。……但是请记住，上星期干了八方，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是，现在他们已经在研究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队部该早一点作准备。”

放下电话，他忽然笑了。当人们发觉自己在干着可笑的事情时，才这么笑的。他请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没走几步路，他又那么笑了，带着请求的口气对我说：

“咱们别谈经验了。扯点别的吧。……”

可是他没说话谈些甚么。我等他开头。这时已走到河边。河上已是一片暮色。远处大桥的桥头，燃起了几点灯火。我们两人同时看见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鹰张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面，其实是站在空气里。几秒钟以后，它飞走了。这时曾刚才开口说：

“有时候，我倒羡慕你们作记者、当作家的。哪儿出了甚么好事，有了甚么经验，你们去写写，在报上登登，任务就完成了。……可是实际怎么样呢？事情明明是好的，经验明明是成功的，要想大干，就有困难。”

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连忙问下去。象平常一样，曾刚回答得很简单：

“半年以前，三分队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额一倍。队部在全队通报表扬，给了奖励。上个月，突破定额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

人，队部也表扬了，可是同时就来了指示，叫分队领导上控制。这几天，青年工人们提出要搞双倍定额运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一个月完成两个月的任务，队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许发动，说这是冒险……”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说：

“不懂？我也不懂。奥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他知道话不是几分钟就谈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

“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谈它。就说这双倍定额罢：前几天党委书记也问过我工作速度能不能加快这个问题。”他拿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个50%，又把它擦掉，说：“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把桥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没有问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力量现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机械设备的运用率不到百分之四十。每年因为施工准备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组织得不好而浪费的人力，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因为没好好组织而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就无法统计了。可是拿青年工人来说，据我了解，把劳动效率普遍提高百分之五十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机器又有了人，你说还缺甚么？”

他用鞋底擦掉那几个数字，猛一下站了起来。被他的脚端掉的一堆土，从陡峭的土崖上急滚下去，就象一条土的河流。土粉在下面流个不断，土块和石块在这“水流”的上面飞跳着朝前滚去，最先落到黄河水里。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需要用斯塔哈诺夫精神来工作。可是为了大家能够用斯塔哈诺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计划、组织、设计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诺夫精神。”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然后询问地望着我。见我点头，就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忽然觉得他那么象个孩子。

晚上，我把这次谈话补记到笔记上。顺便翻一翻前几天笔记上随便乱画的一些问题——“曾刚的经验里最主要的是甚么？”“为甚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着失败的危险？”……忽然觉得好象朝答案前进了一步。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桥梁队长罗立正(我相信自己了解他)不喜欢他手下这个如此得力的干部？

三

不能说罗立正不了解自己的干部，也不能说他不爱才。提拔曾刚作第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是他的意思。也是他，一九五三年里接连几次在队部干部会议上表扬过曾刚，一再提起第三分队对于扭转桥梁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谈话中间也表示过，曾刚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正是周维本的不足之处，虽然也同时表示了对周维本的细心谨慎的推崇。对于曾刚敢于提出一定见解，罗立正也不完全反对。近两年，罗队长不大好提出自己意见来，在讨论计划或总结工作的场合，他宁愿等别人提出个意见、方案，然后点点头说“可以”。通过别人的意见、方案，或者对个别问题提出点修正的意见，总比自己去从头到尾构思、起草要轻松得多啊。一个桥梁队长又没有个自己的秘书！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罗队长和曾工程师的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十二月里一次讨论一九五四年度计划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各科室主任、分队队长相继发言，对计划的某些细节作了些补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壶里